

#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现象思考

张保华

(太行师范学校,山西 左权 032600)

[摘要] 1958 年新民歌运动是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解决了当时文学荒芜,一方面为后来的文学指明了政治方向。新民歌现象不仅展示了诗歌发展史上的怪胎,更能使我们感觉到民族行进途中的阵痛。

[关键词] 1958 年 大跃进 颂歌 右派 政治 文学空白 新民歌

1958 年的文艺大跃进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政治与文学联姻事件。在荒诞的背后,文艺大跃进解决了 1957 年给文坛留下的一系列问题,使原来的纯文学的政治寓言演变为民间式的语言政治,并决定了此后 20 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

首先,面对 1958 年的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民歌进行到 1958 年,引起了国家领袖的关注,而领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创作和收集民歌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8 年 3 月开始,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收集民歌。全国各地迅速成立了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了民歌专栏……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1958 年 9 月 2 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跨上火箭篇》,提出文艺也要大跃进:“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一场文艺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迅速开展了起来,也开始了对产量的高度重视和极端追求。全国各地都在制订计划,下达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就提出一年内要产生 30 万个“李有才”和 30 万个“郭兰英”;因此,被称为“作家”的人数由 1957 年的不足 1000 人,迅速增长到 1958 年的 200000 人。

其次,1958 年的文艺大跃进与 1957 年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从 1956 年开始到 1957 年春天国内形成高潮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潮流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的活跃局面。然而,一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战斗迅速打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有 55 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那些崭露头角、创作力旺盛的年轻作家和诗人几乎被“一网打尽”。它给文坛留下一个迫切的

课题:填充空白,再造文艺繁荣之景。而文艺大跃进正是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填补了反右派运动给文坛留下的空白,并象征性地宣告:即使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照样可以繁荣。

这时的新民歌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歌有了本质的不同,从表现手法上大概分为三类:

一、顺应政治背景的图腾崇拜狂潮,这是解放后颂歌的继续,也成为新民歌的重要选取意象和标准。

农民诗人王老九在见到白洋淀农民诗人王永鸿时写到:“你的歌唱到云霄殿,我的歌唱到水晶宫,不是咱俩太骄傲,而是见到了毛泽东。”在歌颂我们的领袖和新生活的同时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敌人的讽刺,1958 年我们热火朝天地搞大跃进的时候,一首诗歌在描写美国:“生产下降何时了?失业知多少!公司倒闭一阵风……美国不堪回首危机中!满仓货物依然在,只是无人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密士失必向南流!”当中国人民饿的人仰马翻时,1962 年作家萧三在集会上即兴赋诗:“历史的车轮任何反动派也扭不转,‘山姆大叔’其实外强中干。事实是:我们一天天好。事实是:你们一天天烂。”这样的诗歌从反面来衬托我们的伟大。

二、顺应大跃进的浮夸,是新民歌的重要内容,重要的手法是夸张。

“农业生产跃进中,积肥好像打冲锋,田间工作真细致,一串禾穗八钱重。早造歌唱大丰收,晚造还要增产多,社社都有积肥队,上山下海把肥糞。五更吹起东南风,积肥放声齐响亮,钟声歌声齐响亮,割了绿肥天才红。”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

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老虎凳，绞刑架，我伢(们)咬紧钢牙。阴沟里石头要翻身，革命的种子发了芽。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

三、清醒者微乎其微的声音，他们的地位和在学习上的影响并没有使他们的作品弄出响声，相反倒演变为后来声讨他们的责骂。

1959年11月1日，元帅诗人陈毅回到了四川省乐至县视察。乐至县地处川北，是土质瘠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可是由于当时浮夸风劲吹，这个落后的山区县竟被“吹”成了全省的一面“红旗”。

离乐至县城5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山坡，被称为“高产卫星坡”。陈毅在车内听说公社把全部人力和物力都投在高产地上，观车外排排队男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看着这一切苦笑道：“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

1958年11月，刚被任命为中共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著名作家赵树理来到阳城时，一个月的苦战已经结束，人们正在接受1959年的创作任务。该县一个仅有32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6万首，大型剧本40个，中型剧本100个，小型剧本1500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5300个场次。共青团阳城县委召开青年大会，动员大家放“文艺卫星”，特请赵树理去讲话。不料他劈头就说：“我给你们泼冷水来啦！我一个专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诗是语言的精华，你们一个晚上怎么能写出几十首呢？别说放‘卫星’，我看连个‘起火’也放不成。你们年纪轻轻，可不能养成吹嘘夸口的毛病！”赵树理顺手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讽刺放“文艺卫星”的打油诗《招生广告》：“人道作诗难，只因作得少。一天二百首，一月管保好。你若没啥写，题目向我讨；硬自《钢铁歌》，软至《她来了》，随便写一个，然后找材料。‘手

呵动地手，笑呵圆的笑’。莫谓人不懂，难懂方为妙。我住天字街，门牌第一号。祝尔准诗人，前来把名报。”

1934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杂文家、古典小说研究家、诗人聂绀弩，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来到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第五队劳动。对于这一人人天天都要写诗的浮夸风，聂绀弩曾写了《集体写诗》，予以讽刺：“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低头笑问老头儿，我本文盲做甚诗？你替胡诌三两句，明朝任务我完之。”

每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特定的关系，而文学运动在推动一种文体发展的同时，又是该文体失落失语的时代。我们在饕餮民歌的疯狂中，深感民歌在快意中的疼痛。其一是新民歌的文学形式和民间标准的丧失，民歌是文学中的一支山花，在于其纯真朴实和内在秀丽，以及独特的艺术手法，而新民歌由于大众化的行为导致民歌的顺口溜化，舍弃了传统的比兴手法的关注。其二是政治庸俗化导致的后遗症，新民歌太注重和政治攀亲，硬性的意象和不着边际的夸张，终于促使政治的更大的夸张，又由于其全国性和群众性，给整个民族留下了伤痛和后患，也就是说，文化强化了政治上的浮夸，导致后来的浮夸不绝。因此，我们回顾新民歌运动的历史和意义也就非常重要了。

#### [参考文献]

-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 《中国现当代文学》丁帆 朱晓进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 《红色牛棚》赵丰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呸，那里的货色——左权民间音乐舞蹈迷思》刘红庆，“太原道·晋阳书屋”2001年3月。
- 《中国现代名人诗词逸事》黄子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 《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李新宇著，2001年10月出版。
- 《写作与政治》陈晓明著，《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 《新世纪家园——民谣天地》2003年10月。

[责任编辑：米云凤]